

為民族解放事業戰鬥到底

一、揭露「遠東慕尼克」陰謀

「保盟」的主要任務是爭取海外對中國抗戰的援助，它的政治立場就是抗日統一戰線。宋慶齡在一九四一年答宋子文的文章中，說明為著兩個理由「保盟」維護中國的統一戰線：首先，「保盟」的救濟工作「是建立在統一戰線基礎上，並主張中國各地區應該有享受經濟待遇的同等權利」。其次，「因為我們相信統一戰線和團結一切抗日力量是繼續和有效地抵抗日本侵略的唯一保證」。她強調「保衛中國同盟明確地站在中國統一、民主和繼續抗戰的立場，沒有民主就沒有統一，沒有統一就不可能有抗戰」。¹⁵⁴因此，除爭取外援外，她還領導「保盟」堅持統一戰線，堅持團結和進步，堅持抗戰到底，與中外反動派進行廣泛的鬥爭。

一九三八年冬，日本侵佔武漢和廣州後，停止對中國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把軍事進攻的重點轉移到解放區，對國民黨政府採取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的方針。英、法帝

154 宋慶齡：《救濟工作和政治——答宋子文先生》，載《永遠和黨在一起》第二十六、二十七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國主義在這年九月，為了保護自己，唆使德國法西斯東侵蘇聯，與德、義簽訂《慕尼黑協定》，出賣了捷克。接著，他們懷著同樣的目的，為保持他們在中國的利益，引誘日本北攻蘇聯，與日本及國民黨政府談判調解，妄想在日本答應一定的條件之下，勸說中國投降日本。這個「遠東慕尼黑」陰謀，一直進行到一九四〇年。美國後來也參加進來。

在日本誘降及西方帝國主義勸降面前，國民黨政府中分裂出汪精衛賣國集團，在南京成立了日本帝國主義卵翼下的傀儡政府。同時，蔣介石集團也日益加快了對日妥協的步伐，反共反人民的倒退活動日益加劇，製造了許多摩擦事件，掀起了反共浪潮。

宋慶齡對這股滾滾而來的反蘇反共逆流，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一九三九年五月，汪精衛抵達上海，按日本旨意，策劃組織傀儡政府，並且一再侈談「三民主義」，聲稱其投敵之舉是出於「愛護孫先生所手創之中華民國，不忍滅亡於無識者之手」。¹⁵⁵對此，宋慶齡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為紀念孫中山誕辰發表文章，揭露汪精衛這個孫中山的「信徒」，歷史上曾多次懷疑三民主義，受到孫中山的斥責。指出：「中山先生離開南京時，曾對其黨內同志中數人，表示失望；現全國人士，均對汪精衛失望，此國家叛徒，竟敢盜竊中山先生之遺教，其恬不知恥，有如此者。」¹⁵⁶

155 汪精衛：《重要聲明》（一九三九年四月九日），載汪偽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編：《汪主席和平建國言論集》第三十五頁，一九四〇年十月版。

156 重慶《新華日報》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汪精衛叛國後，屬於該集團的香港《南華日報》、《天演》、《自由》三家報刊社工友八十余人，相繼宣佈辭職，脫離三家報刊。他們的愛國行動立即得到中國共產黨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同情和支持。在這些工友生活困難時，重慶《新華日報》向各界人民呼籲，支持三報社工友們的鬥爭。毛澤東、林伯渠、董必武、鄧穎超、葉挺及八路軍駐桂林通訊處全體工作人員等，還有重慶的工人、學生、青年都紛紛捐款幫助他們。十月二十四日，《新華日報》匯款三千三百元給香港的宋慶齡，托她轉交給罷工離職的工友，並致函說：「先生對於救亡抗戰，不但主張堅決，而且領導有方，素為中外人士所欽敬。」



一九三九年，與何香凝（右一）在香港合影。

此次香港三報工友反汪罷工，當表贊助；用敢以瑣事煩神，定獲先生俯允。」¹⁵⁷

宋慶齡收到此信及捐款後，即轉交罷工工友，並將收據在十一月七日寄給《新華日報》¹⁵⁸。

宋慶齡還在許多文章中，撻伐汪精衛叛國集團，並在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汪偽南京政府成立的第二天，與宋藹齡、宋美齡連袂飛渝訪問，以示團結反汪，粉碎了日本散佈的中國抗日統一戰線已經分裂的謠言。

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遠東慕尼黑陰謀正在加緊進行的時候，宋慶齡接連發表《抗戰以後的中國——抗戰二周年紀念告美國友人》、《真正實現中國的獨立》、《中國需要更多的民主》等文，總結孫中山辛亥革命教訓，申述實行「三民主義」爭取「真正實現中國獨立」的意見，痛斥英、美等國為實現遠東慕尼黑協定，竟「幫助日本加強軍事機構」，以迫使「中國媾和投降」。¹⁵⁹同時，宋慶齡又批判蔣介石集團對日求和、準備投降、限制民主、製造摩擦等倒行逆施的行為，指出「和平停戰」，必使抗戰「走向失敗道路」。¹⁶⁰

國民黨政府及美英帝國主義對宋慶齡的言論，既害怕又惱火。他們先是通過港英當局對宋慶齡進行恐嚇和威脅，接著又托英國駐華大使向宋慶齡施加壓力，提醒她對蔣介石所採取

157 重慶《新華日報》，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158 重慶《新華日報》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日。

159 《中國需要更多的民主——為紐約〈亞細亞〉雜誌作》，載《宋慶齡選集》第一百五十一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

160 重慶《新華日報》一九四〇年七月九日。

的曖昧策略不要多加批評，並勸說放棄「保盟」工作離港他去。宋慶齡嚴詞拒絕了這位外交官的無理要求。¹⁶¹之後，他們遷怒於中國共產黨，就指使港英當局突然封閉了八路軍、新四軍駐香港辦事處，拘留連貫等工作人員。經過宋慶齡邀集一些國際友人進行交涉，五個月之後，連貫等才獲釋。

由於中國共產黨和宋慶齡等中國人民的堅決鬥爭，日本帝國主義的誘降策略始終沒有得逞。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歐美國主義策劃的「遠東慕尼黑」陰謀也隨之徹底破產了。

二、及時揭露皖南事變真相

國民黨頑固派對日妥協、對內分裂的高潮，是一九四一年初發動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它的如意算盤是企圖在日本軍隊的配合下，一舉消滅在抗戰中屢建功勳的新四軍。

一九四一年一月七日，新四軍這支九千餘人的英雄部隊，在久負盛名的葉挺軍長率領下，奉國民黨軍委之命轉移時，遭到國民黨部隊七萬餘人的包圍和襲擊，大部分壯烈犧牲，葉挺被俘，僅有千餘人突圍得救。一月十七日，蔣介石以國民黨軍委的名義發佈命令，掩蓋事實真相，反誣新四軍叛變，悍然宣佈取消新四軍的番號，並將葉挺軍長「交軍法審判」。至此，

161 參見愛潑斯坦：《我所瞭解的宋慶齡》；廖承志《保衛中國同盟的初創時期》，載《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四日。

第二次反共高潮達到最高峰。

事件發生後，國民黨反動派自知理虧，嚴密封鎖新聞，不准中外報紙作任何報導。中國共產黨在重慶的《新華日報》被迫開了「天窗」；周恩來在「天窗」上憤怒而痛心地書寫一首痛斥國民黨罪行的詩：

千古奇冤，江南一葉；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宋慶齡得悉消息後，即在一月十四日和何香凝、柳亞子、彭澤民聯名起草一封致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的公開信，指出：「抗戰進入第五年度，敵人失敗之局已定……我國人自當堅信而共作決心以赴之……然而最近則有討伐共軍之聲，甚囂塵上，中外視聽為之一變。國人既惶惶深憂兄弟鬩牆之重見今日，友邦亦竊竊私議中國之勢難保持。倘不幸而構成剿共之事實，豈僅過去所經歷之慘痛又將重演，實足使抗建已成之基礎墮於一旦；而時勢所趨又非昔比，則我國家民族以及我黨之前途將更有不堪設想者。」公開信重申孫中山關於「提攜共黨」、「喚起民眾」等遺訓，提醒蔣介石勿忘他自己說過的「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均有抗日救國之責任」等「豪言壯語」和聯共抗日的諾言，痛陳國共團結或分裂對國家民族及各黨派的利害，憤怒譴責蔣介石集團背信棄義，襲擊新四軍的罪行，呼籲「撤

銷剿共部署、解決聯共方案、發展各抗日實力、保障各種抗日黨派」。¹⁶²

這封公開信，無疑是對蔣介石集團沉重的打擊。所以，國民黨政府駐港辦事處採取一系列緊急措施，扣留公開信，不准發表，並以將殺害被扣的葉挺相威脅。最後，何香凝、柳亞子以國民黨釋放葉挺為條件，答應不公開發表這封信。但是國民黨並沒有履行諾言。葉挺直到一九四六年三月才在中共中央的嚴重交涉下獲釋。

國民黨不履行當時釋放葉挺的諾言，還反咬一口，在一九四一年四月二日開除柳亞子的國民黨籍，誣衊其散佈「反國策言論」。何香凝立即向記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破壞抗戰實行反共的「皖南事變」。一月十四日，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彭澤民聯名致函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憤怒譴責他們的背信棄義，並呼「撤銷剿共部署、解決聯共方案、發展各抗日實力、保障各種抗日黨派」。圖為他們致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函。

者發表談話予以駁斥，指出他與宋慶齡等致蔣介石的信，「代表人民公意，海內外同胞當有同感。但此可稱為『違反國策』則何為國策？國策何在？實言之驚心！」¹⁶³

宋慶齡對蔣介石不抱幻想。她又在十八日聯合何香凝、陳友仁通電蔣介石：「彈壓共產黨則中國有發生內戰之危險，今後必須絕對停止以武力攻擊共產黨，必須停止彈壓共產黨行動。」

此電石九日在香港報紙上公布於眾。二十六日又刊登在延安的《新中華報》上。這樣，就有力地打破了國民黨的新聞封鎖，起到了中共在《新華日報》上未能起到的作用，再次給患難中的共產黨人以無比珍貴的支持，加深了雙方的戰鬥友誼。

與此同時，斯諾也從廖承志處瞭解到皖南事變的消息。在國民黨阻止他在重慶報導後，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八日，宋慶齡、何香凝、陳友仁聯名通電蔣介石，痛斥他破壞抗戰、實行反共的倒行逆施。這是刊登在一月二十六日延安《新華日報》上的電文摘要。

得到宋慶齡的幫助，通過香港發出多則電訊，報導「皖南事變」。

二十五日，「保盟」的《新聞通訊》以《堅持統一戰線》為題發表長篇文章，詳細報導新四軍遭到襲擊的經過，指出「其中大半是受了傷的躺在擔架上的官兵，以及政治工作人員、醫生、護士和他們的家眷等」。文章對事變進行評論，批駁了國民黨對新四軍「抗命」的誣蔑，指出發動內戰的企圖只能使日本更進一步地侵入中國。該文還報導了周恩來就事件向蔣介石提出的十二個條件，讚揚共產黨為挽救統一戰線，堅持團結抗戰所採取的克制態度。

新中國成立後，當宋慶齡回憶這一段歷史時指出：「世界各地有許多人是在保衛中國同盟的《新聞通訊》上第一次知道了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變』，那正是日本對中國的威脅最嚴重的時刻，而國民黨竟對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總部進行了罪惡的伏擊與破壞。」¹⁶⁴

正是由於宋慶齡和「保盟」的上述努力，當國內因為國民黨的封鎖，大多數人對皖南事變還蒙在鼓裡的時候，國際上卻已普遍傳播這個消息。於是，聲援新四軍、抗議國民黨的輿論就一起指向了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使他們陷於被動。

在國外，各地華僑紛紛發表通電和文章，呼籲「抗日圖存」、「反對民族分裂，反對反共內戰」。強烈要求克服這一空前的嚴重危機，爭取時局的好轉，以保存抗戰實力，團結抗戰到底。英、美等國的進步人士也都紛紛反對蔣介石發動反共內戰。尤其與「保盟」有聯繫的各

援華機構，紛紛來電來函，群起回應宋慶齡的主張，對中國的事態發展表示嚴重的關切。宋慶齡都把它們發表在《新聞通訊》上，廣泛宣傳，擴大影響。其中有美國援華委員會主席賈斯特·羅威爾、基督教聯盟主席法蘭西斯·斯科麥克、加利福尼亞州州長貝特·沃爾遜等聯名簽發致蔣介石電報，指出：「中國內部的自相殘殺將導致美國對華援助的減少。我們堅信：為了打敗日本侵略者並保持同美國的友誼，中國的統一戰線一定會繼續保持下去。」¹⁶⁵ 舊金山的中國委員會執行書記波利納·簡特勒給蔣介石的信說：「中國必須繼續團結，自相殘殺的衝突意味著滅亡，意味著中國三年半以來為之奮鬥的事業將前功盡棄」；「應該把中國人民的全部力量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個強大的中國。不要使得對英勇中國的信任受到動搖，不要失去同情中國抗戰的人們的信任」。¹⁶⁶ 英國援華委員會主席、上議院議員也表示深切希望「統一戰線能夠繼續保持」。

在這種形勢下，連歐美各國政府也不得不認真考慮這時中國發生反共內戰對他們是不利的。英、美政府從斯諾報導中瞭解到中國發生的事情後，立即要求他們的駐華使節作出報告。英國駐華大使阿奇博爾德從老朋友王安娜處瞭解到事件的真相，然後又把周恩來請到自己家裡交談。他向倫敦報告，不僅證實新四軍事件是真實的，而且還說「國民黨即將對延安大舉

165 《新聞通訊》第二十八期，一九四一年四月一日。
166 同上。

進攻」。167英國政府接到駐華大使的報告後，「表示非常關切，並告訴蔣介石，內戰只會加強日軍的攻擊」。168美國駐重慶大使的報告，依據國民黨政府的說法，認為此事件只是單純的「軍紀處分」。但「皖南事變」時卡爾遜中校正好在中國，他回到美國後，向羅斯福總統提供了有關事件的第一手材料。於是美國政府立刻作出反應，甚至「中斷了向中國政府提供一筆新貸款的談判」。財政部長摩根索還明確表示，「如果重開內戰，重慶就別指望從美國獲得更多的財政援助」。169蘇聯政府也表明了同樣的態度。

在香港和內地，宋慶齡更是不顧國民黨政府的白色恐怖，領導「保盟」及愛國民主人士，與共產黨團結戰鬥，掀起抗議浪潮。一九四一年四月，「保盟」名譽書記克拉克夫人發表演講，讚揚新四軍功績和皖南事變所造成的嚴重後果：「由於新四軍佔領了南京周圍地區，南京政府汪精衛在自由中國的信徒們之間的任何和平運動，都不可能得以成功……正是由於一月初所發生的事件，日本人及其傀儡部隊已佔據了原在新四軍控制下的許多地區。」170

在「保盟」出版委員會工作的鄒韜奮，發表題為《中國政治演進的展望》的評論，贊同宋慶齡「沒有民主就沒有團結」的觀點，駁斥國民黨製造皖南事變的藉口，抨擊其壓制人民

167 轉引自《中共問題重要文獻》第一百三十九頁，《大公報》社版。

168 [美] 埃德加·斯诺：《復始之旅》第二百八十九頁，新華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169 [聯邦德國] 王安娜：《中國——我的第二故鄉》第三百六十一頁，三聯書店一九八〇年版。

170 《新聞通訊》第二十九期，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五日。

民主權利的政策。他還與「保盟」中央委員金仲華等九人聯名發表《我們對於國事的態度和主張》，表示：「對於陰謀出賣國家，破壞抗戰之惡勢力，則一息尚存，誓當與之奮鬥到底。」¹⁷¹

對國民黨倒退行為最有力的打擊，是宋慶齡寫《「七七」四周年》一文。文章總結了抗戰以來的經驗，強調指出全民族的團結，是繼續抗戰的唯一條件，並嚴厲批評皖南事變的製造者，是破壞內部團結，主張妥協投降的行動。文章很有戰鬥力，擊中了頑固派的要害。為此，國民黨「審查」機構將它扣壓，不准在原擬的重慶《新華日報》上發表。但是正義的聲音是封鎖不住的，經過努力，獲港英當局通過，終於發表在七月七日的《華商報》上，隨後就轉輾流傳到國統區，狠狠地打擊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倒行逆施。

宋慶齡深刻地懂得維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必須堅持原則，堅持鬥爭。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妥協求團結，則團結亡。自然，這種鬥爭應是合理、有利、有節的。這一點，又充分表現在她對宋子文的批評幫助上。

在對待皖南事變問題上，宋子文這位「走鋼絲」的政治家又右傾了。當時，他正在美國，受了反動派的蠱惑宣傳，攻擊「保盟」刊物刊載評論皖南事變文章使「保盟」成為「國內政黨的工具」，因此五月三十日，他致電「保盟」中央名譽書記克拉克夫人，提出要辭去他「保

盟」會長的職務，並要求發表他去電的全文。

宋慶齡認為宋子文擔任「保盟」會長已有三年，對「保盟」和「工合」做出一定的貢獻，是令人高興的，現在提出辭職則是倒退行動，決不能無原則地遷就。她和「保盟」中央決定堅持「保盟」的正確立場，在第二天（即六月一日），即覆電宋子文，表示：「我作為保衛中國同盟的主席，對於宋博士採取了這一個步驟，只有表示遺憾。」並駁斥宋子文對「保盟」的指責說：「現在，任何有關黨派的說話，都是混淆視聽的。目前在中國只有兩種真正的政策：一是集中一切力量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二是妥協、投降和屈服。」「保衛中國同盟全力擁護第一種政策。如果這樣做，便是『有黨派』的話，那麼我肯定宋博士也是有黨派的……我們對支援中國的統一從不動搖。我們對任何危害中國統一的事物堅決反對。」¹⁷²

六月十四日，宋慶齡又主持起草「保盟」中央答宋子文的公開信《救濟工作和政治》，以三年來「保盟」工作的大量事實，闡明了一系列原則問題。

公開信中重申「保盟」只支持統一、民主，和對抗戰各方都予支援、一視同仁的原則立場。闡明了「保盟」支援八路軍、新四軍的正義性，揭露了國民黨頑固派干擾「保盟」這一原則的執行，阻止支援國際和平醫院物資的通行、直到發動皖南事變等一系列罪惡行徑，而且指出：「當『皖南事變』發生後，我們有理由不只痛恨中國人打中國人這件怪誕而野蠻的事件，

而且我們也為毀壞了新四軍的一支醫療隊伍而痛心。它的工作是中國遊擊隊裡醫療工作的模範。這支醫療隊主要是由保衛中國同盟支援的醫藥器械和款物建立起來、維持下去的。」

公開信中堅定地表示：「我們將繼續在本委員會的報告和印刷品中呼籲：恢復中國的統一戰線，加強中國的團結，放棄那些親者痛、仇者快的國內爭端。對此，我們否認是替任何一個組織或任何一個中國的政黨在講話。並不過分地說，我們是在替大多數的人民在講話，是在替那些被日本人的子彈打傷的任何一個中國友人在講話。」

宋慶齡光明磊落，她把宋子文辭職的電報及「保盟」中央覆信的全文，都發表在六月十五日出版的《新聞通訊》第三十三期上，公之於眾，讓國內外公正輿論評斷誰是誰非，這實際是再一次向國內外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破壞抗戰的罪惡行徑。宋慶齡一貫以民族和革命的利益為重。宋氏家族兄弟姐妹的手足之情，在任何時候都沒有影響她採取正確的立場。

宋慶齡愛恨分明，在譴責國民黨頑固派的同時，對受害的新四軍表示深切的關懷。

事變發生後，宋慶齡盼望早日見到新四軍的人員，瞭解事變真相及所造成的損失。中共中央對蔣介石的倒退行為，採取的是針鋒相對的鬥爭。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八日，即國民黨宣佈取消新四軍番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向全黨發佈指示，說明事變真相和反對國民黨進攻的方針。二十日，中共中央軍委發佈重整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堅決抗擊國民黨取消新四軍的命令，陳毅和劉少奇就任後，即派沈其震再次去香港，向宋慶齡介紹事變經過，以釋惦念。

沈其震回憶當時的情況是：宋慶齡見到我，頭一句話就擔心地問：「我們這次損失這麼大，還有力量嗎？」我向她詳細地轉達了劉少奇和陳毅的話，並說：「請您放心，黨中央和毛主席都在延安嘛！」她聽到這句話，開心地笑了，輕聲地說：「啊，延安……」並在很短的時間內又為新四軍籌集了一批物資，通過各種管道，運送到新四軍。¹⁷³

立場堅定，愛恨分明。宋慶齡在皖南事變問題上，對國民黨、共產黨及宋子文等各方面不同態度，再一次顯示出她在民族革命鬥爭嚴峻的時刻，作為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所具有的特殊風貌。

在國際國內輿論的強烈譴責下，蔣介石集團很快陷入被動境地，他只好被迫停止反共升級的行動，取消了對八路軍原計劃的軍事進攻。當然，促使蔣介石懸崖勒馬的主要力量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部隊作了反擊的準備；在政治上，共產黨又聯合中國一切正義力量，包括宋慶齡領導的「保盟」，對國民黨頑固派發起了總攻擊。如果蔣介石一意孤行，勢必與汪精衛同流合污，被中國和世界人民所唾棄，因此他不得不有所收斂。

蔣介石對首先置他於被動境地的宋慶齡、斯諾等極端痛恨。但對宋慶齡一時無計可施，就先報復斯諾。斯諾在一九三六年得宋慶齡幫助，突破封鎖進入西北蘇區，寫出《西行漫記》，給國民黨以沉重的打擊，因此，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忌恨。這一次，又是他首先突破封鎖，

報導了皖南事變，國民黨惱羞成怒，再次取消了他的記者資格，他被迫離開中國。

斯諾回國後，曾拜見羅斯福總統，向他介紹了中國共產黨艱苦抗日的情況、「工合」運動和蔣介石政府的腐敗。這有利於羅斯福對中國的瞭解，從而促使在抗戰最後一二年，美國對中國國共兩黨的關係出現了一些令人高興的現象。

三、從香港轉移到重慶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飛機偷襲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接著，日軍又進攻香港，人們紛紛撤向內地。

這時，宋慶齡主持的「嘉年華會」還未結束，為了多為抗戰做些工作，從來不考慮個人安危。當廖承志根據中共中央指示，首先安排在香港的文化界和愛國民主人士八百多人撤走後。十二月二十五日，宋慶齡才在「保盟」工作人員堅決要求下，搭啟德機場的最後一班飛機去重慶。當時離香港淪陷只有六小時，日軍已經逼近機場了。飛機起飛後幾分鐘，機場即遭轟炸，飛機幾乎是從敵人的頭頂上飛過去的。宋慶齡的離港真是千鈞一髮。

「保盟」的工作人員，也像宋慶齡一樣，都堅持工作到最後。名譽司庫法朗士在參加城防志願隊作戰時犧牲了。傑姆·貝特蘭被關進了日本的戰俘營，邱茉莉（愛潑斯坦的未婚妻）和英文秘書塞爾溫·克拉克夫人被關進拘留營。愛潑斯坦等九名委員被迫喬裝躲藏起來。當時日本人知道愛潑斯坦的名字及其在「保盟」中為中國人民抗戰事業所做的貢獻，對他恨之

入骨，決定抓住他後把他殺掉，所以，他的處境十分危急。但他由於堅持工作，已經無法逃離香港。為了他的安全，中共地下黨把他帶到一位美國醫生家，給他動了一個「外科手術」——左小腿製造一個傷口，然後躲進醫院伺機逃回內地。然後，廖承志向《華南日報》去電話說：「告訴你們一個不幸的消息，愛潑斯坦被日本飛機炸死了。」消息一下子流傳開來，迷惑了敵人。

廖承志組織營救了大批革命者和愛國者，但他自己卻在一九四二年春，因叛徒告密，在廣東樂昌被國民黨特務逮捕，關進臭名昭著的上饒集中營，飽受折磨。直到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在宋慶齡和中共代表團的不斷營救下，才被釋放出獄。

宋慶齡到重慶後，蔣介石等坐臥不安。當時，他們正處在「皖南事變」被揭穿後的狼狽處境中，對宋慶齡餘恨未消。但各階層人民群眾，對宋慶齡的到來，感到極為興奮。消息不脛而走，給在「皖南事變」後籠罩著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氣的霧都重慶，增添了新的希望和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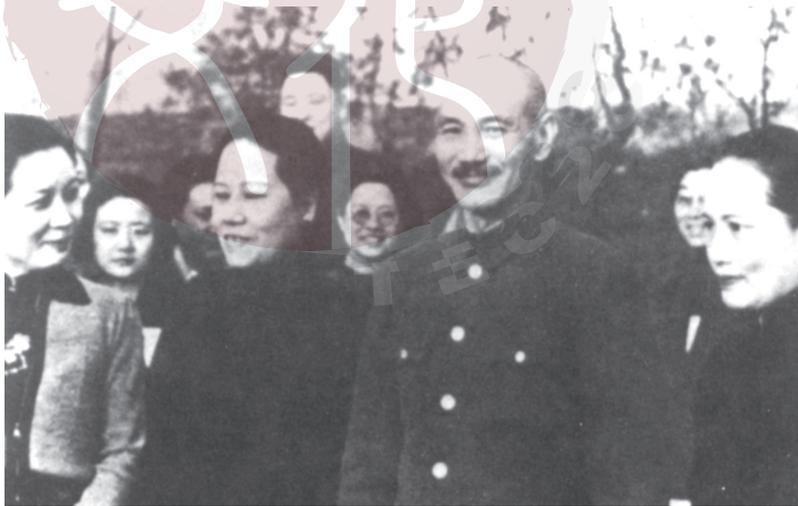
蔣介石對宋慶齡到重慶的不快和冷淡態度，引起國民黨內一些正直人士的不滿。有人找



一九四二年攝於重慶。

了國民黨元老之一的覃振，覃振又找到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這才在國府禮堂開了一個茶話會，表示歡迎之意。那天到會的國民黨中委有一、二百人，像于右任、李烈鈞、居正、張繼、戴傳賢這些國民黨元老都來了，但蔣介石卻避不露面。在茶話會上覃振代表大部分與會者的心意，一面哭一面說：「我們歡迎孫夫人給我們講話，孫夫人是最民主的，是我們最敬佩的人！」宋慶齡在熱烈的掌聲中站立起來，大義凜然，侃侃而談。她說，抗戰軍興已經五年，必須堅持到底，收復一切失地，方能對得起流血流汗的前方將士和廣大人民。她還說，要爭取抗戰勝利，必須實行民主，發揚民氣；搞專制，搞個人獨裁，是一定要打敗仗的。最後她還說，各黨各派要團結起來，一致對外，萬不可兄弟鬩牆，手足相殘。她指責

國民黨違反了中山先生的遺教，有人名為孫中山的信徒，實則是孫中山的叛徒。當她說到激動處，也禁不住落了淚。她這一番義正詞嚴的講話，使一些天良未泯的國民黨元老無不動容，



一九四二年在重慶。右起：宋慶齡、蔣介石、宋藹齡、宋美齡。

也使那些躲在會場一角的頑固分子如陳果夫、陳立夫之流狼狽失色。這是何等的愛恨分明、涇渭分明啊！¹⁷⁴

蔣介石把宋慶齡安置在她的姐姐宋藹齡家中，表面上佯作關懷，暗中卻布置特務監視她的行動。當時與宋慶齡有交往的在美國駐華使館工作的費正清回憶：「甚至她想離開重慶到中國別處去換換空氣也不行，更不用說到國外出。」¹⁷⁵她也沒有會見客人的自由。每一個到宋慶齡住處去的人都會受到便衣特務的監視、跟蹤和威脅。後來，依靠弟弟宋子文的幫助，才在敵機轟炸過的「黃山」斷牆殘壁間的一棟樓裡安居下來。此處名「松籟閣」，原是本世紀初富商黃雲階修建的花園，故取名「黃山」。宋子文雖因辭去「保盟」會長職務的事與宋慶齡鬧了一場糾紛，但雙方都遵循著一個原則，即政治分歧不應損害手足之情，所以他還是幫助宋慶齡安頓了住處。

住進松籟閣後，宋慶齡也僅得「一樓之中的自由」，因為樓外仍有特務在監視，而且蔣介石對宋慶齡仍想除之而後快，只是由於宋子文、宋美齡的保護，他才一直未能動手。

宋慶齡來到重慶，宋美齡十分高興。她特地交代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侍衛長俞濟時給宋慶齡安裝一部對外不公開的電話，以便她倆隨時使用，經常敘敘家常。她倆通話，多數是宋美齡先呼喚：「接宋委員電話（當時慶齡仍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電話接通後，

174 參見王昆侖：《宋慶齡——畢生為新中國奮鬥的忠誠戰士》，載《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三日。

175 費正清：《嚮往中國五十年的回憶》第二百七十六頁，一九八二年紐約版。

她倆就用地地道道的上海話交談，以示親昵。她倆通話時的語氣也是十分親切熱情的。就這樣，倆人的關係更加親密了。因此，當得知蔣介石要加害於宋慶齡時，宋美齡出於手足之情，就與哥哥宋子文一起，設法保護姐姐。

有一天，宋美齡打電話給宋子文說：「你關照他們（指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等人）一下，不准在阿姊那裡胡來，如果我聽到有什麼的，我是決不答應的。」她的聲音很高，語氣非常尖厲，很氣憤。宋子文回答：「好的，我馬上就通知他們。」戴笠對於孔祥熙、宋子文一向很尊敬，而且也很聽話，因為要常向孔、宋伸手要錢。¹⁷⁶當時特務機關確實打算對宋慶齡採取行動，宋美齡知道後堅決反對。據一個特務頭目——重慶航空檢查所主任姚某曾對人說：「戴老闆對此非常為難，很傷腦筋，照委員長意旨辦嘛，夫人不答應，鬧出亂子來，委員長還是拗不過夫人，大家都有所顧忌。底下人都知道，鬧出亂子來吃罪不起。而且戴老闆也深知夫人是不好惹的。」¹⁷⁷所以特務們一直不敢動手。

在一九四二年頭三個月，「保盟」不僅喪失了在香港的基地，連在菲律賓、馬來亞和荷屬東印度（印度尼西尼）等地，一些支持「保盟」的愛國和進步的華僑組織，也都落入敵人手中。

在「保盟」駐重慶通訊員王安娜和中共代表團的幫助下，宋慶齡著手恢復「保盟」。周恩

176 王正元：《宋美齡的姊妹情誼》，載《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九輯，王正元在抗戰時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電話監聽員。
177 同上。

來把廖夢醒從澳門調回幫助宋慶齡。起初，只有她們三個人：宋慶齡、王安娜、廖夢醒。後來，其他工作人員或喬裝、或從集中營中逃出來，聚集到了重慶，有了足夠數目的委員，在八月下旬，正式重新組織起「保盟」的中央委員會。「保盟」又繼續活動了。

由於在重慶國民黨政府的控制下，「保盟」的工作很難開展。國外的援助在一九三九年歐戰爆發後，已經大幅度減少，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更加急劇下降。如果不進行宣傳，中國這個已經降為次要地位的戰場，將完全被忽視。但是，「保盟」的宣傳工作，在離開香港時已被完全摧毀。現在面臨政治封鎖、經濟困難、人員缺乏、印刷無門等困難，已不可能繼續出版、郵寄定期

刊物和印刷品了。這就使「保盟」與海外朋友缺少聯繫，影響了大規模募捐運動的開展。

在這種情況下，「保盟」的對外宣傳，主要只能通過宋慶齡的聲明、信函和文章了。例如，



一九四三年，宋慶齡、宋藹齡、宋美齡在重慶視察孤兒院。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五日，她給海內外朋友寫了「保盟」遷渝後的第一份工作報告：《從香港到重慶》。三天後，又寫了《給中國在海外的朋友們的公開信》。一九四四年二月八日，她寫了《致美國工人們》。三月十二日，又為在美國舉行的孫中山紀念日發表了題為《孫中山與中國的民主》的廣播演說等等。

在《從香港到重慶》一文中，宋慶齡報告「保盟」遷渝一年多來的工作，指出在中國及國際情況新變化的形勢下，國際援助對中國堅持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全域，具有更大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因此，「保盟」的工作責任就更重要了。她對海外朋友說：「捐贈對『保盟』的工作意義很重要。它象徵著外國對中國團結抗日的興趣，間接地削弱了破壞團結的力量。在『保盟』的整個存在的過程中，它強調團結。現在，當這些成果為不祥的陰影籠罩著，預兆著新的和自殺性的內戰時，我們更要強調這一點。世界人民是能夠和必須阻止這種戰亂的。」

在公開信中，宋慶齡向外國朋友具有說服力地證明「保盟」過去一再聲明的原則是完全正確的：「幫助中國人民並幫助你們自己。」並且指出，今天「在抗日前線的中國軍隊和人民的武裝部隊仍然擔當著遠東反法西斯戰爭的前衛，中國人民的武裝部隊進行鬥爭，實行民主，把許多孤立的遊擊據點擴大為敵後強大的抗日根據地」。

在這裡，宋慶齡可以向盟軍表示自豪的，主要是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日遊擊戰爭及其所起的作用。使她更高興的是，在盟軍向德日意法西斯進行搏鬥的艱苦年月，中國的抗戰將充分顯示出對友軍的支援作用。她說：「我們的優秀戰士並沒有因為已有的成就而居功自滿。」

現在既然有別人加入了戰鬥，那麼他們的唯一的要求就是全世界的戰線上都要盡最大的力量來作戰。至於他們自己，雖然作戰的時間較久，但他們並不借此就要求絲毫減少作為一個同盟國家應負的責任。」

鑒於此，宋慶齡又根據互相支援的思想，向國際友人呼籲繼續支援中國人民的鬥爭，特別支援在中國戰場上抗擊著日本在華一半兵力、卻由於封鎖、已有三年沒有得到任何援助的共產黨部隊。

由於蔣介石總是把外援用於加強他的獨裁統治和分裂活動上，因此，宋慶齡對外國朋友強調說：「救濟只是反法西斯的救濟。救濟只是爭取民主的救濟。只有這樣辦，才能幫助中國人民並幫助你們自己。」她進一步指出：「中國沒有團結，整個反法西斯陣營沒有團結，就不能獲得勝利。沒有民主，就不能有團結。沒有人民的積極性，就不能有民主。中國救濟事業，作為積極的、民主的活動，就是要按照平等按照比例的原則對所有抗日的人予以援助。」這就意味着只有共產黨領導的軍民才有資格得到援助。所以宋慶齡理直氣壯地宣告：「本同盟反對『中立』的救濟觀念，主張首先把援助送給反侵略的戰士們，因為如果不是他們用鬥爭來擋住了侵略者的路，那麼，侵略者獲得勝利之後就會造成那樣深重的苦難，即使全世界的救濟力量也無濟於事了。」

在開展對外宣傳工作的同時，宋慶齡領導「保盟」積極設法與國外援助機構恢復關係，爭取他們繼續支持「保盟」的工作。

這項工作雖然十分艱巨，但是有了那些一直在海外支援「保盟」工作的機構的忠實的和主動的幫助下，工作就比較容易些了。這些機構有紐約美國援華委員會、加拿大維多利亞醫療援華委員會、加拿大維爾農中國戰災救濟委員會、荷屬西印度阿魯巴愛國華僑協會和後來在倫敦的中國運動委員會。

「保盟」首先與紐約美國援華會及其駐重慶代表建立了良好關係。來自這個機構的捐款相當多而且是經常的。令人感動的是，其他國家一些較小機構，雖然它們還不知道「保盟」是否仍舊存在，也還繼續匯款來。而美國的勞工組織未經申請，也向「保盟」伸出了援助的手。在這方面的先驅者是國際皮革製革廠工人工會。它以數目可觀的捐款支援晉察冀邊區的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建立分院，負擔它一年的部分開支。「保盟」與其他工會也建立了關係，從美國全國海員工會的職員、職業工作者工會也得到了大量的捐獻。「保盟」又和駐重慶的美國紅十字會和美國醫藥援華會的官員們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有好幾次它們都給予可貴的幫助。

「保盟」的工作條件十分艱苦。宋慶齡後來回憶說：「我們竟然連房子都沒有，我自己的客廳成了唯一的安全的辦公地點和開會場所。我們與外國朋友和海外僑胞的聯繫都必須加以偽裝。」¹⁷⁸宋慶齡和「保盟」的報告、聲明等文件，就在打字機列印後，送到國外，由英、美等國友好的通訊社、雜誌社發表。「因為人民之間的友誼並不是偶然產生的，而是建立在根本

178 宋慶齡：《為人民服務四十年》，載《永遠和黨在一起》第一百七十六、一百七十七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的共同利益的基礎上，是能穿越任何封鎖的。」¹⁷⁹在重慶三年多時間裡，他們不但要與特務周旋，還要不斷地與國民黨政府的社會局作鬥爭。廖夢醒回憶說：「因為保盟所籌得的款物，極大部分是交給解放區的，他們在處心積慮地尋找藉口來對我們進行破壞和迫害。」¹⁸⁰他們要「保盟」登記，干涉「保盟」的存款，要「保盟」報告款項的分配和用途。對此，「保盟」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四、迎接抗戰勝利

在重慶，宋慶齡領導「保盟」，把工作重點依然放在支援共產黨及八路軍、新四軍方面，她知道他們是爭取抗戰最後勝利，建立新中國的根本保證。

到重慶後，宋慶齡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更加緊密了。「保盟」和八路軍辦事處之間建立了正常的聯繫。宋慶齡和周恩來經常有信件來往，廖夢醒就是他們的連絡人。她回憶說：「我為了完成送信任務，常常要同國民黨特務的跟蹤作鬥爭。由於國民黨的軍事封鎖和新聞封鎖，我們得到八路軍和解放區的消息是非常困難的。為了徵集向國外宣傳的資料，常常邀請從解放區出來的人參加我們的會議，請他們報告在解放區的觀感，寫成文章寄到國外去發表。」¹⁸¹

179 宋慶齡：《為人民服務四十年》，載《永遠和黨在一起》第一百七十六、一百七十七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180 廖夢醒：《保衛中國同盟在重慶時期的工作》，載《永遠和黨在一起》第七十九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181 同上。

一九四二年底，宋慶齡在住所設宴歡送董必武返回延安，周恩來、鄧穎超夫婦，馮玉祥、李德全夫婦和徐舜英等應邀出席。徐舜英回憶：席間，大家圍坐在壁爐前面，凝神聆聽周恩來分析西北戰場的戰績和國內外形勢，整個客廳一片肅靜。那時窗外雪花飛舞，室內爐火正紅，壁爐架上交叉地垂擺著兩株秋收時新割的禾穗，壁爐裡跳躍的火焰映著金黃色穗粒，顯得黃澄澄的十分可愛。李德全指著兩株禾穗大聲讚歎：「你們瞧，多麼好看啊！這兩株禾穗簡直像金子鑄成的一樣！」宋慶齡笑著說：「這比金子還要寶貴呢！我們的國家自古以來就是農業立國，農民占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年年五穀豐登，人民才有好日子過。在幾億農民的心目中，這飽滿的禾穗不就如金子還好嗎？」周恩來雙手撫弄著禾穗，點點頭說：「將來打下江山，人民坐了天下，一定要把這兩株禾穗畫在新中國的國徽上面去！」大家齊聲贊同，並舉杯祝願新中國早日誕生！¹⁸²

宋慶齡有時也參加共產黨舉行的活動。一九四三年《新華日報》創刊五周年，在化龍橋報館的操場上舉行慶祝活動。宋慶齡由鄧穎超陪同，觀看由榮高棠等演出的、在抗日根據地流行的秧歌劇《兄妹開荒》等文藝節目。因為她長期被國民黨特務監視在家，除「保盟」重大的募捐活動需她當面主持外，一般深居簡出，很難有機會到自己人中間，所以這一天她興致極濃，特別高興。

182 參見徐舜英：《我們時代的一顆巨星——憶宋慶齡居留港渝時》，載《宋慶齡紀念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皖南事變」後，由於日偽頑的聯合包圍和進攻，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抗日根據地的處境更加困難。為此，宋慶齡和「保盟」對八路軍、新四軍的援助給予更多的關注。

為了開展新環境下的工作，宋慶齡必須吸收新委員，擴大統一戰線。她千方百計衝破國民黨對她的封鎖，通過很多方式和外界建立聯繫，委任一位年輕的美國人約翰·福斯特任「保盟」的新司庫。宋慶齡經常派福斯特把募捐來的救濟款送到八路軍辦事處，由他們轉給國際和平醫院，或用於延安和解放區的其他一些事業。在這方面，宋慶齡還爭取到擔任孔祥熙顧問的艾德勒的幫助。

宋慶齡的秘書、「保盟」的財務主任廖夢醒回憶：「由我經手收到海外的捐款，大部分是送交延安的。取款時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汽車在約定的時間開到中國銀行門前等著，我直接找孔祥熙的顧問艾德勒先生，向他們提取現金。有時一取就是兩三麻袋。我讓汽車載走麻袋後，就獨自走回家去。艾德勒同冀朝鼎同志合作得很好，一點不露馬腳，孔祥熙還挺信任他們哩。」¹⁸³

根據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保盟」的月度款項表統計，宋慶齡到重慶後，「保盟」給國際和平醫院的援助捐款是：一九四二年：七萬五千四百美元；一九四三年：五萬四千五百美元；一九四四年：一萬兩千五百美元、四億七千二百〇九萬七千八百五十元法幣；

一九四五年：五百一十萬〇三千四百八十美元、一百六十六億一千七百五十六萬二千九百〇四元法幣。

除國際和平醫院之外，「保盟」還對抗日根據地的其他許多單位長期提供援助，如延安醫科大學、延安合作藥廠、延安「工合」事務所，延安的魯迅藝術學校和抗日軍政大學、延安技術學校、陝甘寧邊區八路軍醫藥製造廠、陝甘寧邊區的洛杉磯孤兒院、陝甘寧邊區基礎學校、晉東南的延安醫大分部、晉東南工合事務所和河北西部的白求恩醫學院等。

至於物資的運送，「保盟」在英美等盟國的幫助下，經過宋慶齡和共產黨的頑強鬥爭，終於恢復了中斷三年之久的對八路軍、新四軍的物資援助。一九四三年六月，「保盟」援助國際和平醫院的一批物資，包括寶貴的外科手術器械和磺胺藥品，由八路軍談判代表護送，通過國民黨的關卡，進入了遊擊區。在這方面，宋慶齡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緬印聯合戰區指揮官、美國約瑟夫·史迪威的友好合作。史迪威為人正直而且富有正義感，同情中國人民的鬥爭，尤其欽佩八路軍、新四軍艱苦抗戰的精神。他與宋慶齡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這時，中國與外面的通道只有一條緬滇公路。史迪威經常幫助「保盟」用這條公路運送物資，還同意讓從印度飛來的美國軍用飛機，幫助「保盟」將藥品及救濟物資運往延安和解放區，甚至從他管轄的軍用倉庫裡撥出一些藥品和物資送給八路軍和新四軍。

史迪威幫助把一架X光機運到延安，是個十分感人的事件。廖夢醒追憶說：「有一次，國外捐來一架大型X光機。那時能飛到延安去的只有美國軍用飛機。可是這部X光機體積很大，

搬不進艙門。我請示恩來同志，他叫我去跟慶齡同志商量。慶齡同志讓我去找史迪威將軍的楊副官。那是一個夏威夷華僑，深得史迪威信任。我把情況說明後，他立刻報告史迪威將軍。史迪威將軍向來欽佩孫夫人，一口答應幫忙。他怕夜長夢多，下令馬上改建一架軍用飛機的艙門，把X光機裝進去就飛往延安。」¹⁸⁴一天後，X光機安抵延安，周恩來親自把這個消息告



宋慶齡在重慶會見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史迪威將軍。



一九四三年，宋慶齡在重慶會見美國空軍上尉陳平。陳平曾經為保衛中國同盟空運檔和藥品至延安。

訴了「保盟」。宋慶齡說，這台大型X光機，「是當時總人口已達九千萬的解放區的第一台和僅有的一台」。¹⁸⁵這X光機一直到一九八一年宋慶齡逝世時，還在解放軍西安第四軍醫大學裡為中國人民服務，而且清晰度良好。

與此同時，宋慶齡還給共產黨根據地軍民最珍貴的政治上的援助。

鑒於美國與國民黨政府的特殊關係，鑒於美國關心中國抗戰對其太平洋戰爭的影響，宋慶齡在不斷譴責蔣介石制造反共摩擦的同時，加緊了對美國輿論的爭取工作，爭取更多的國際進步力量站到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及民主力量一邊，幫助共產黨和民主力量的發展。

一九四四年二月八日，宋慶齡在《致美國工人們》的公開信中，深刻地闡明中國抗戰和民主與美國工人階級利益「休戚攸關」的道理，呼籲他們支援中國人民反對蔣介石封鎖壓迫遊擊區的鬥爭。指出：「凡是民主制度最強大的地方，凡是發揮了人民的積極性的地方，凡是人民戰爭（人民戰爭是一個經濟落後與缺乏武裝的國家能夠擊退一個優勢裝備的侵略者的唯一的武器）最不受掣肘的地方，中國的抗戰在那裡也就最偉大和最有力。」這些地方「就是在陝北和敵後的根據地」。可是「我們的國家軍隊」有一部分被調去封鎖遊擊區，甚至企圖消滅他們。因此，宋慶齡大聲呼籲：「美國工人要表示他們對中國抗戰關心，最好的辦法就是要求把他們自己製造出來的生產品和禮物平等分配給一切積極抗日的中國軍隊，不論它在

什麼地區；凡是不這樣做的軍隊，就不予分配。」、「現在第一步就是取消不人道的封鎖，這種封鎖使得給敵人重大殺傷的遊擊隊的受傷戰士得不到必需的醫藥。如果這種起碼的人道主義的第一個步驟還沒有做到，空談民主是不會有多大意義的。」¹⁸⁶

宋慶齡在積極支援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同時，還熱忱關心國民黨統治區人民的疾苦。

一九四二年冬——一九四三年春，由於黃河決堤，河南省遭到特大水災，五百萬人死亡，千千萬萬災民流離失所，哀鴻遍野。廣東省也有數百萬人受到災害的影響。國民政府腐敗，救災無力，情況十分危急。宋慶齡愛民情深，領導「保盟」積極投入救災活動。「保盟」負擔起救災的宣傳和動員工作，為救濟河南和廣東的災民設立了兩個國際組織，爭取外國救災援助。同時，宋慶齡又在國內組織救災義演和義賽。在重慶就募得三十萬法幣。¹⁸⁷

一九四三年五月在重慶山城的優秀足球隊積極回應足球義賽，最後選定四支中外球隊進行比賽。宋慶齡和英國駐華大使卡爾等參加了這次國際賑災賽的開幕式和閉幕式。在開幕式上，宋慶齡向各隊運動員握手獻花，鼓勵運動員賽出水準，為受難同胞賑災做出貢獻。她還親自為球賽開球。由於宋慶齡的號召，每場比賽的入場券都被搶購一空。在閉幕式上，宋慶齡親自向各隊贈送獎旗，給每個運動員發了紀念章。紀念章上鐫刻著：「參加籌賑豫災足球義賽紀念孫宋慶齡贈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這次義賽募捐活動的收入共達十二萬五千五百三十

186 《宋慶齡選集》第一百七十一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

187 宋慶齡：《從香港到重慶》，載《保衛中國同盟報告》，一九四三年美國紐約本第三十六頁。

元。「保盟」立即把這筆款匯給設立在陝西寶雞的豫災賑濟委員會。

這次河南受災的地區，有十個縣完全被日軍侵佔，七十一個縣是國統區，二十九個縣是共產黨抗日的遊擊區。但是一般的救災援助僅限於國統區，宋慶齡知道後，特意把在美國援華會幫助下，從聯合救濟會取得的五萬美元的捐款，撥給河南遊擊區的災民。¹⁸⁸

這年七月，宋慶齡為賑濟粵東災民，還舉辦了國際音樂會義演，邀請在重慶的中、美、蘇、英音樂工作者參加演奏，得到中外觀眾熱烈歡迎。時值抗戰艱苦時期，重慶劇場的經理、劇作家和演員等的經濟收入比較差，但對宋慶齡組織的募捐義演都踴躍參加，「愉快地與孫夫人合作」，因為他們知道，宋慶齡曾作出過許多努力去幫助生活困難的藝術家、科學家和文化界人士。

一九四四年四月，魚米之鄉的湖南，由於長期遭到日軍的燒殺搶掠和國民黨的無止境的搜刮，也赤貧成災，三百萬難民掙扎在死亡線上。為救濟湘災，宋慶齡組織了書畫物品展覽義賣和歌舞義演。在義賣會上，宋慶齡捐賣了一個珠寶粉盒，買進三幅畫和一些物品。在她的帶動下，許多外國朋友和人民群眾、書畫家和廠商，踴躍參加義賣、義買。第一天僅書畫品銷售就達四十余萬元。戴愛蓮、斯義桂等藝術家，再次接受宋慶齡的邀請，作精彩表演，義演淨收入達四萬九千九百多元。兩項收入全部捐贈給湘災救濟機構。

188 宋慶齡：《從香港到重慶》，載《保衛中國同盟報告》，一九四三年美國紐約本第三十六頁。

一九四四年，宋慶齡還與中共合作，為援助國統區貧病作家組織募捐活動。這些作家不甘當亡國奴，以筆作武器，進行文化救亡運動，寫出大量作品打擊侵略者，反對獨裁統治，為中國抗戰做出積極的貢獻。可是，他們大部分從淪陷區流亡到內地，又不斷受到日、偽及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迫害，沒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貧病交加。從七月開始，全國文藝界抗敵總會在中共的推動下，發起各界大力援助貧病作家的運動，在《新華日報》上進行宣傳和發動工作。九月，宋慶齡出面主辦了兩天文娛晚會，為援助貧病作家募捐義演。文藝界抗敵總會也開展了一系列募捐活動。整個運動收入達一百〇三萬八千餘元。得到援助的進步作家有艾蕪、邵荃麟、黃藥眠、端木蕻良、司馬文森、陳殘雲和孟超等。

「保盟」還舉辦慈善舞會。那時到重慶來的外國人，特別是年輕單身的美國人越來越多，舉辦舞會會受到國際友人的歡迎；而且辦舞會不需花太多的人力和費用，卻可以在舞會上募到許多捐款，於是「保盟」決定舉辦舞會。雖然宋慶齡從來不跳舞，但她經常參加舞會。因為她的出席可以防止國民黨特務的搗亂，又可以吸引許多中外名流來參加。在她的影響下，連英國大使夫人華萊·西摩亞也參加組織舞會的委員會，而且在舞會上，不管是誰邀她共舞，她都有求必應，把這視為自己的義務。

一九四三年以後，隨著國際上反法西斯戰爭的節節勝利，中國人民也熬過了抗戰中最艱苦的歲月，迎來了勝利的曙光。蔣介石妄圖恢復抗戰前的獨裁統治，為搶奪抗戰勝利果實作輿論準備，他採取了一系列進一步剝奪人民民主權利、限制人民言論、出版自由的措施。在

三月份，拋出了由陶希聖等以他名義出版的《中國之命運》，公開宣揚法西斯主義，鼓吹國民黨一黨專政。他們乘共產國際宣佈解散之機，叫囂「解散共產黨，交出邊區」。同時，蔣介石又加強包圍陝甘寧邊區的兵力，在七、八月份發動了幾十次武裝挑釁。

隨著中國抗戰勝利的到來，黑暗與光明——兩個中國命運決戰的前哨戰開始了。

宋慶齡堅決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她在三月份紀念孫中山逝世所發表的談話中指出：「應該實現總理的三大政策，開國民會議，在絕對民主的原則下，動員全國民眾，使他們都有等的機會參加抗戰建國工作。對各黨各派，也應該給以同等的機會，使他們的黨員得盡個人的能力參加工作，爭取最後勝利。」¹⁸⁹

接著，宋慶齡又在《致中國工人們》（一九四四年二月八日）、《孫中山與中國民主——為在美國舉行的孫中山紀念日所作的廣播演說》（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等一系列信函和演說中，與蔣介石針鋒相對，勇敢地發出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取消對陝甘寧邊區的封鎖、實行各黨各派真正平等、切實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吼聲，為廣大國統區人民指明了新的鬥爭方向。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及各個民主黨派的鬥爭目標。一九四四年九月，中共代表林伯渠在重慶召開的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上，正式提出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得到各民主黨派、各階層人民的熱烈響應。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在中國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擊下，日本帝國主義宣佈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經過八年艱辛的浴血抗戰，付出巨大犧牲之後，終於取得了渴望已久的勝利。

全國人民歡欣鼓舞、熱淚盈眶，紛紛湧上街頭歡慶勝利。宋慶齡雖然也同山城重慶的人民群眾一道歡欣鼓舞地迎接勝利的到來，但她已意識到更嚴酷的鬥爭即將來臨，因而顯得十分平靜，陷於深沉的思索中。她在思考著如何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一起，為新中國的誕生做最後的拼搏。

